

中国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及不平衡测算研究

杨沫 朱美丽 尹婷婷*

摘要：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内涵出发，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现状以及不平衡程度进行测算。本文的研究发现：（1）2013-2018年中国总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其中，创新发展与共享发展增长幅度较大；（2）东部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而中西部省份体现出更强的增长势头；（3）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平衡程度有所降低，但是省域之间的创新和开放发展水平差距拉大，促增了总体不平衡程度。对此，本文提出因地制宜充分挖掘地区优势、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强化区域协调战略、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深化开放发展、补齐民生短板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评价指标；省域经济

DOI:10.19313/j.cnki.cn10-1223/f.2021.05.001

一、问题的提出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是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客观要求。如何客观评价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科学测度中国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平衡程度？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些成为了亟待研究的问题。准确理解高质量发展内涵、科学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成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所在。关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指导思想。在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上，随着发展模式的改变，传统以GDP增长为标准的发展评价体系不再适应。

关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影响因素及对策（吕承超和崔悦，2020）。大量研究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资源效率、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等因素存在紧密的联系（陈诗一和陈登科，2018；高培勇等，2019；Peng et al., 2021）。高培勇等（2020）指出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总括性理念，经济高质量是社会高质量和治理高质量的输出。杜爱国（2018）提出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内涵在于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核心条件是促进相对制度变迁。袁晓玲等（2019）则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数量扩张和质量提高二者的高度统一，高质量发展是党中央“五大发展理念”协同作用的基本发展形态，其目标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充分、均衡的发展。简新华和聂长飞（2019）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和高质量发展具有本质区别，虽然两者都注重“质”，但是高质量发展的含义更为广泛，不仅包含经济因素，而且包含社会、环境、政府治理、人们美好生活等诸多方面。针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存在的问题，聂长飞和简新华（2020）提出在关注高质量发展指数提升的同时，必须重视各省份高质量发展水平不平衡的问题。吕承超和崔悦

* 杨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朱美丽，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尹婷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治理视角下公共服务供给的财政制度研究”（71833002）的资助。

(2020) 提出实施区域协调提升战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科技创新力、完善金融体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转变经济发展理念等政策建议。

二是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的探讨。已有研究中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的评价指标构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们对于经济发展质量的理解。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仅仅是实现经济的高增长率(Hong, 1994)。国外学者 Solow(1956)、Jorgenson 和 Griliches(1967)最早使用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等单一维度来测度经济增长率,沈利生和王恒(2006)采用增加值率来度量经济增长质量;余泳泽等(2019)创新性地提出包含环境因素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城市维度深入分析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区域差异。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上,国内学者也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实现高效跃升、专项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源泉(王一鸣, 2020; 刘志彪和凌永辉, 2020)。随着经济发展质量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采用单一指标、维度衡量经济发展质量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仍存在局限性,单一维度指标无法综合反映经济发展的全貌,无法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Train, 2000; Barro, 2002; Manish, 2016; 严成樑, 2020; 杨耀武和张平, 2021)。

基于此考虑,国外学者将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指标扩展到涵盖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生态环境、社会福利、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政府管理、市场开放度、金融发展、企业创新等方面(Train, 2000; Sabatini, 2008; Barro, 2002; Manish, 2016; Ahmed et. al, 2021; Gu et. al, 2020)。依托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部分学者开始探讨基础设施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等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Jahanger, 2020; Zhou et. al, 2021)。十九大以后,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评价体系,国内学者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宏观层面,根据研究的对象不同,可以分为全国、省域、市县以及特定地区等层面(孙志燕和侯永志, 2019; 张震和刘雪梦, 2019; 吕承超和崔悦, 2020; 凌连新和阳国亮, 2020; 欧进锋等, 2020; 杨耀武和张平, 2021)。例如,吕承超和崔悦(2020)从经济活力、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成果共享六个层面构建指标体系,对中国 1997-2017 年 30 个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时空收敛情况进行研究;杨耀武和张平(2021)从经济成果分配、人力资本及其分布情况、经济效率与稳定性、自然资源与环境、社会状况相关指标五个方面对于中国 1993-2018 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进行测度,测度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处于中高速阶段的 2013-2018 年,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最快。欧进锋等(2020)从“五大发展理念”出发把握高质量发展内涵,构建包含 20 个指标的评价体系,对广东省 21 个地级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发现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珠三角普遍较高,粤东西北落后”“沿海经济带较高,山区城市较低”的空间分布特征。

基于评价指标的科学性、丰富性、可比性等考虑,对中国省域层面高质量发展进行测算和比较,更能反映出区域发展的整体状况和不平衡性,对于未来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与路径更加具有指导意义。目前,已有中国省域层面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依据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其一,基于经济发展“高质量”特征,认为高质量增长有别于过去单纯的数量型增长(鲁邦克等, 2019; 聂长飞和简新华, 2020)。聂长飞和简新华(2020)按照中央文件精神,依据“四高一好”高质量发展的理解,从产品服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以及经济运行状态五个方面选取代表性的指标来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其二,认为高质量发展主要是解决新时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马茹等, 2019; 张军扩等, 2020)。马茹等(2019)从中国社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新矛盾中有效供给不足、无效产能过剩等问题出发,选取了高质量供给、高质量需求、发展效率、经济运行和对外开放五个维度的指标来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其三,从“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出发,以五大发展理念作为指导思想来指导高质量发展,在深入研究五大发展理念内涵的基础上,构建指标评价体系(吴志军和梁晴, 2020; 吕承超和崔悦, 2020)。

虽然已有关于中国省域层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在数据选取、指标体系构建、指标赋权

方法等方面具有不同的考量，但是其研究结果均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即发现我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非均衡发展特征，总体呈现出“东中西依次递减”的分布格局。

根据上述的文献梳理可知，目前关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仍处于探索阶段，真正权威客观的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尚未形成。国内的研究者基于自身对于现实问题的把握、中央文件学习以及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理解来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本文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具体内涵出发，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3-2018年31个省份的宏观面板数据，对中国省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及不平衡情况进行测度和评估。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研究选取中国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的时间段，指标体系丰富健全，避免对单一经济维度的过于强调，能更好地刻画新阶段中国省域经济发展质量；其二，在评估省域层面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情况进行深入研究。从高质量发展的不同内涵维度出发对不平衡程度进行分解，有助于抓住发展不平衡的关键矛盾所在；其三，是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估的理论研究和评估实践的丰富，有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体系的构建。

二、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构建及方法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的高质量发展，其评价指标体系应建立在对于新发展理念深刻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准确把握新发展理念的“根”与“魂”，全面把握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充分考虑到新阶段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本文在对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的发展内涵进行分析阐述的基础上，构建**树形多层指标体系**，对我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进行评价。

（一）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

在高质量发展指标的具体选择上，本文充分考虑新发展理念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征，兼顾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主要遵循以下几点原则：一是指标的全面性和科学性。尽可能全面地反映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同时又要考虑科学性和客观性。以权威数据作为支撑，数据来源于的官方数据库和公开出版物；二是指标的系统性和层次性。同时包含反映发展水平的静态指标和发展增量的动态指标，从不同层次、不同侧面、不同角度系统反映新发展理念实际践行情况。三是指标的可操作性和可比性。一方面考虑指标的**可量化以及数据的可得性**，另一方面考虑指标的**横向和纵向可比性**，在不同地区之间横向可比，同一地区在不同时间点上纵向可比。基于上述原则，本文构建的高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包含**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5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47个基础指标**（见表1）。

1. 创新发展。创新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的问题。创新驱动发展，创新发展是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战略支撑。创新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基础条件**，**经济发展、政府投入以及硬件设备、人才储备**是创新发展的土壤和源泉。与此同时，创新也需要投入，其中**研发经费与人力资本的投入**最为基础和关键。在具备创新基础、确保创新投入的情况下，**创新产出及成效**在评价创新发展水平方面尤为重要。其中，**创新成效**在创新产出的基础上更进一层，是创新发展水平的高层次目标。因此，本文从**创新基础、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成效**4个维度出发，构建**13个基础指标**对创新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具体涵盖**经济增长、互联网发展、企业研发投入、专利申请**等。

2. 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旨在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协调发展需要增强发展的整体性，**产业、区域、城乡的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新发展阶段，**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仍在继续，**第三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协调发展十分重要。与此同时，

新发展阶段，区域、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是突出，“全面”发展既要东部率先，也要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既要城市繁荣，也要乡村振兴。除此之外，各省份之间的人口结构协调、精神文明协调也十分关键。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凸显，老年人的占比一定程度反映出各地区发展需要承担的成本。基于此，本文从产业结构、城乡结构、人口结构以及精神文明4个维度出发，构建了6个基础指标对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具体包括第三产业的占比、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不平等、65岁以上人口占比、文化产业固定资产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

3. 绿色发展。绿色发展重点解决人和自然和谐问题。《“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传统的发展路径高度依赖土地、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的投入，必然会与生态保护产生矛盾和冲突，是一条不可持续之路。走绿色发展之路，既强调要保护环境，顺应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又要注重经济发展，建设生态、宜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因此，本文在构建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时，充分考虑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资源利用以及政策支持等多个方面，兼顾绿色和发展两个层面。具体而言，从资源利用、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和政策支持4个维度出发，构建了13个基础指标对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具体涵盖单位GDP的能耗和水耗、工业“三废”的排放和PM2.5浓度、森林覆盖率、环保相关的政府投入等。

4. 开放发展。扩大开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新发展阶段，我国将逐渐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之下，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不再是简单的对外开放，而是需要扩大对外贸易，深化资金、人才、科技等领域国际合作，推动商品、要素等领域开放形成协同效应（叶辅靖和李大伟，2021）。基于此，本文采用开放深度、开放结构两个二级指标对开放发展质量进行测度。其中，开放深度包含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GDP的比重、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4个基础指标，开放结构包含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一个基础指标。

5. 共享发展。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经济发展的成果是否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共享十分重要。实现社会公平、人人共享需要通过普惠来实现。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让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成员，主要体现在教育质量、就业创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同时，共享发展的目标是共同富裕，除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之外，贫困发生率降低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据此，本文从发展基础、公共服务、文化设施、生态文明以及贫困状况5个维度出发，构建包含城镇登记失业率、民生支出、基本公共服务等10个基础指标。

表1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属性	权重	
创新发展 (20%)	人均GDP(元)	正向指标	2%	
	创新基础 (5%)	财政支出/GDP	正向指标	1%
		宽带接入端口(万个)	正向指标	1%
		每十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人/十万)	正向指标	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主营业务收入	正向指标	2%
	创新投入 (5%)	科学技术支出/财政支出	正向指标	2%
		研发人员数量(万人)	正向指标	1%
		万人专利授权量(件)	正向指标	2%
	创新产出 (5%)	研究与开发机构有效发明专利件数(件)	正向指标	1%
		技术市场成交额(亿元)	正向指标	2%
		新产品销售收入/主营业务收入	正向指标	2%
	创新成效 (5%)	高技术产业R&D全时当量(人年)	正向指标	2%
		国内有效专利数(件)	正向指标	1%

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属性	权重
协调发展 (20%)	产业结构 (5%)	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 (%)	正向指标	5%
		城乡结构 (8%)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逆向指标
	人口结构 (3%)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	逆向指标	4%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 (%)	逆向指标	3%
	精神文明 (4%)	文化产业固定资产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	正向指标	2%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重 (%)	正向指标	2%	
绿色发展 (20%)	资源利用 (6%)	单位 GDP 能耗 (万吨标准煤/亿元)	逆向指标	2%
		单位 GDP 水耗 (立方米/元)	逆向指标	2%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	正向指标	2%
	环境质量 (6%)	废水排放量 (万吨)	逆向指标	1%
		二氧化硫排放量 (万吨)	逆向指标	1%
		氮氧化物排放量 (万吨)	逆向指标	1%
		烟(粉)尘排放量 (万吨)	逆向指标	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万吨)	逆向指标	1%
		PM2.5 浓度 (微克/立方米)	逆向指标	1%
	生态保护 (2%)	森林覆盖率 (%)	正向指标	2%
	政策支持 (6%)	环境保护支出/财政支出	正向指标	2%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GDP	正向指标	2%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GDP	正向指标	2%
开放发展 (20%)	开放深度 (16%)	进出口总额/GDP	正向指标	4%
		外商直接投资/GDP	正向指标	4%
		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GDP	正向指标	4%
		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 (亿美元)	正向指标	4%
	开放结构 (4%)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出口总额	正向指标	4%
共享发展 (20%)	发展基础 (4%)	城镇登记失业率 (%)	逆向指标	2%
		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三大民生支出总和/财政支出	正向指标	2%
	公共服务 (4%)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	正向指标	1%
		每千人医疗机构床位数 (张/千人)	正向指标	1%
		小学教育生师比	逆向指标	1%
	文化设施 (4%)	初中教育生师比	逆向指标	1%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 (本)	正向指标	4%
	生态文明 (4%)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亩)	正向指标	2%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正向指标	2%
	贫困状况 (4%)	每万人贫困人数 (人)	逆向指标	4%

数据来源：2014-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等。针对少数年份个别省份数据缺失的问题，本文采取了前后年份均值插补，或者按照年均增长率进行插补的方法对缺失数据进行补充。指标属性上，正向指标指对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的指标，逆向指标指对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作用的指标。

（二）评价指标体系赋权及测度方法

本文以新发展理念作为指导，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具体内涵设计指标体系来测度我国省域间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以及不平衡程度。在建立指标体系后，将采取一定的赋权和测度方法，对31个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进行测度和比较。对省域间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测算，一方面有助于了解不同省份发展的优势与短板，另一方面有助于了解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平衡性，为改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基于此，本文将高质量发展指数定义为一种相对指数，用于评价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全国所处的相对位置。首先，对各指标进行去量纲化处理；然后，采取合适的赋权方法对各指标赋相应的权重；最后，采用线性加权方法计算各省份高质量发展指数。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指标去量纲化。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指数化分别为公式（1）和公式（2）：

$$X_{ij} = \frac{x_{ij} - x_{ij\min}}{x_{ij\max} - x_{ij\min}} \quad (1)$$

$$X_{ij} = \frac{x_{ij\max} - x_{ij}}{x_{ij\max} - x_{ij\min}} \quad (2)$$

其中， i 表示第 i 项指标， j 表示第 j 个省份（市、自治区）， x_{ij} 表示第 j 个省份第 i 个指标数据的真实值， $x_{ij\max}$ 、 $x_{ij\min}$ 分别表示 x_{ij}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第二步，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 w_i 。本文主要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构造指标体系，其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方面属于综合性指标，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难以通过客观赋权方法进行加权（朱子云，2019）。在一级指标的赋权上，考虑到五大发展理念在新发展理念中占据同等重要的地位，本文对五个一级指标赋相等的权重（各占20%）；在二级指标、基础指标的赋权上，本文也采取主观赋权方法，充分考虑各项指标的均衡性，尽可能采取等权重的方法进行赋权。同时，也综合考虑一级指标的具体内涵与侧重点。例如，对绿色发展指标赋权，环境质量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需要凸显绿色发展的方式、节能减排的力度、废弃排放物的利用率等。所以，本文将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下的六个与环境质量相关指标的权重设置为1%。

第三步，计算五大发展理念指数以及综合发展指数。本文利用线性加权的方法计算五大发展理念各维度以及综合高质量发展指数，见公式（3）：

$$Q_j = \sum_{i=1}^K (X_{ij} \times w_i) \quad (3)$$

其中， Q_j 表示第 j 个省份的高质量发展指数。根据本文所采取的树形指标体系，线性指标加权的方法可分别计算各省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指数，以及综合高质量发展指数。

三、我国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变化趋势及评价

基于2013-2018年全国层面和31个省份的宏观历史数据，以及上文中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和赋权方法，可以得到我国总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变化情况和31个省份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以及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的排名及变化趋势。

（一）2013-2018年我国总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变化趋势

2013-2018年，我国总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见图1），从2013年的0.252增长至2018年的0.787，增长了两倍以上。其中，创新发展和共享发展的增长幅度较大，2018年的创新发展指数是2013年的13倍以上，2018年的共享发展指数是2013年的16倍以上；但是开放发展水平有所收窄，2018年的开放发展水平指数仅为2013年的0.6左右。

表 2 2013-2018 年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

年份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综合
2013	0.014	0.044	0.053	0.130	0.011	0.252
2014	0.036	0.074	0.075	0.101	0.062	0.348
2015	0.065	0.117	0.093	0.090	0.078	0.442
2016	0.098	0.140	0.103	0.074	0.118	0.532
2017	0.130	0.143	0.127	0.104	0.160	0.664
2018	0.192	0.138	0.199	0.079	0.179	0.7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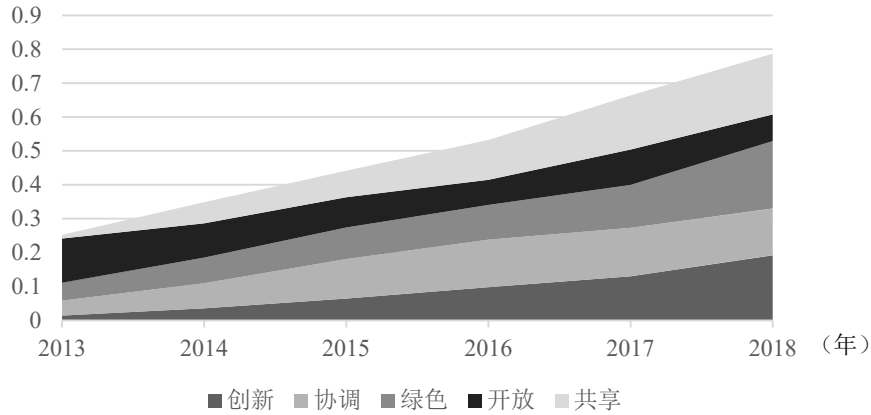


图 1 2013-2018 年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变化趋势

(二) 各省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排名及变化趋势

基于新发展理念内涵构建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以及 2013-2018 年的省级层面宏观数据，本文计算得到了我国各省份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的发展指数，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综合发展指数）。根据测算，2013-2018 年我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及平均值的排序情况见表 3，各省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排名和变化趋势见图 2 和图 3。

表 3 2013-2018 年中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地区	省份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平均值	平均值排序	平均增速
东部地区	北京	0.670	0.696	0.637	0.641	0.640	0.645	0.655	1	-0.68%
	天津	0.492	0.510	0.463	0.491	0.441	0.465	0.477	6	-0.86%
	河北	0.325	0.330	0.314	0.307	0.343	0.357	0.329	22	2.02%
	上海	0.587	0.612	0.574	0.583	0.569	0.567	0.582	2	-0.65%
	江苏	0.488	0.510	0.483	0.481	0.450	0.456	0.478	5	-1.27%
	浙江	0.484	0.500	0.475	0.493	0.496	0.500	0.491	4	0.70%
	福建	0.421	0.415	0.396	0.396	0.397	0.400	0.404	8	-1.00%
	山东	0.400	0.407	0.374	0.377	0.409	0.421	0.398	9	1.15%
	广东	0.581	0.572	0.546	0.562	0.537	0.558	0.559	3	-0.74%
海南	0.427	0.420	0.402	0.387	0.452	0.464	0.425	7	1.93%	
中部地区	山西	0.353	0.346	0.337	0.364	0.303	0.309	0.335	21	-2.23%
	安徽	0.353	0.356	0.351	0.360	0.362	0.367	0.358	15	0.81%
	江西	0.353	0.367	0.359	0.353	0.358	0.369	0.360	13	0.97%
	河南	0.351	0.350	0.350	0.362	0.355	0.378	0.357	16	1.51%
	湖北	0.378	0.395	0.376	0.398	0.388	0.389	0.387	11	0.68%
	湖南	0.333	0.337	0.332	0.336	0.360	0.370	0.345	18	2.18%

续表

地区	省份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平均值	平均值排序	平均增速
西部地区	内蒙古	0.322	0.322	0.309	0.314	0.316	0.310	0.316	25	-0.74%
	广西	0.292	0.314	0.316	0.317	0.336	0.339	0.319	23	3.09%
	重庆	0.393	0.392	0.389	0.391	0.409	0.409	0.397	10	0.82%
	四川	0.358	0.365	0.354	0.365	0.354	0.363	0.360	14	0.36%
	贵州	0.266	0.275	0.297	0.296	0.295	0.301	0.289	30	2.56%
	云南	0.300	0.304	0.292	0.304	0.324	0.317	0.307	26	1.21%
	西藏	0.287	0.269	0.314	0.274	0.322	0.315	0.297	29	2.61%
	陕西	0.365	0.378	0.379	0.389	0.349	0.348	0.368	12	-0.84%
	甘肃	0.320	0.297	0.303	0.312	0.289	0.294	0.303	27	-1.60%
	青海	0.314	0.290	0.302	0.292	0.302	0.301	0.300	28	-0.77%
东北地区	宁夏	0.315	0.327	0.324	0.309	0.313	0.310	0.316	24	-0.26%
	新疆	0.309	0.299	0.285	0.273	0.275	0.269	0.285	31	-2.77%
	辽宁	0.353	0.336	0.329	0.344	0.348	0.341	0.342	19	-0.64%
	吉林	0.356	0.345	0.331	0.330	0.321	0.333	0.336	20	-1.26%
黑龙江	0.376	0.354	0.345	0.340	0.362	0.357	0.356	17	-0.96%	

注：考虑到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本文将东北三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作为一个单独的区域进行分析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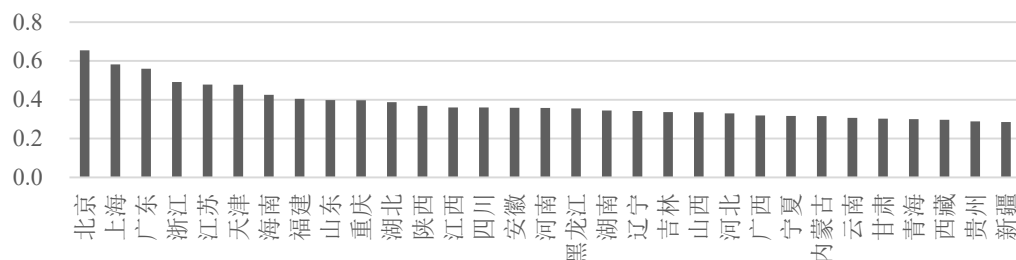


图2 2013-2018年全国各省份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平均值

从表3和图2中2013-2018年高质量发展指数(综合发展指数)平均值的排序来看,东、中、东北、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阶梯状分布。2013-2018年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其次是中部地区,东北地区介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其中,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的高质量发展分别位于全国前五位,该结论与吕承超和崔悦(2020)测度结果基本一致。从区域内部的排名差异来看,东部地区除河北省以外,其余九个省份分别位于全国的前九位;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内部各省份的排名离散程度较小;西部地区内部各省份之间的差异较大,重庆市、陕西省和四川省在全国排名分别为第10、12和14,其余省份的排名比较靠后。从表3的平均增长率来看,中部地区和部分西部地区呈现正向增长,其中广西、西藏和贵州2013-2018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平均增长率居于全国的前三位;东部地区的大部分省份和东北三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呈现出负向增长,说明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虽然较弱,但是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快速增长,后劲十足。从图3的变化趋势来看,各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2013-2018年,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过程,2015年两个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平均最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出波动性上升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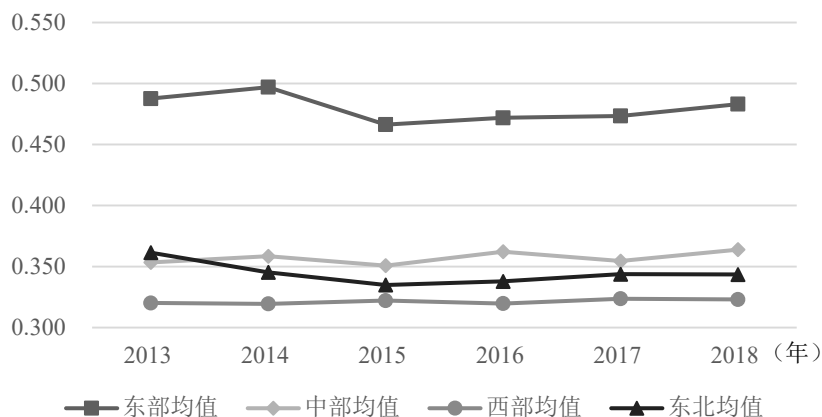


图3 2013-2018年全国及东、中、西、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值及变化

(三) 五大发展维度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比较

上文中，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变化趋势的分析表明，东、中、东北、西部省份呈现出明显的阶梯状分布，而且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较弱的省份呈现出快速的追赶趋势。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深入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五个维度，分析和比较各省份区域在五个维度的发展排名及变化情况。

从创新发展质量指数来看，东部地区的广东、北京、江苏、浙江、上海位居全国前五位；部分中部省份，如湖北、安徽、河南跻身全国创新发展的前十位。从2013-2018年的平均发展增速来看，宁夏、江西、贵州、河南和重庆的增速居于全国前五位，均超过了5%。创新方面，我国东部地区保持领先地位，但部分中西部省份正在快速追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创新驱动发展。

从协调发展质量指数来看，海南、北京、天津、黑龙江、浙江位居前五位。主要因为海南十分重视精神文明发展，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较高；北京的产业结构协调性好，第三产业占比较高；而天津、黑龙江以及浙江的居民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程度较低。相比较而言，中西部地区，云南、重庆、贵州、陕西等省份排名相对靠后。从2013-2018年的平均发展增速来看，广西、重庆、河南、海南以及内蒙古位于前五位，表明中西部地区虽然在协调发展上相对弱势，但是具有更大的增长潜力和更强的增长势头。

从绿色发展质量指数来看，北京、海南、重庆、西藏、福建位居全国前五位。其中，北京、福建、海南等东部沿海省份在环境污染治理、城市绿化建设方面具有更大的投入，绿色治理水平较高；而重庆、西藏、云南、贵州等西部省份主要在自然环境资源、生态保护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从2013-2018年的平均发展增速来看，河南、西藏、上海、河北、海南、贵州等地绿色发展水平年均增速排名靠前，表明东中部省份在确保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开始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而西部欠发达省份在保护环境自然资源的同时，开始探索绿色发展的道路。

从开放发展质量指数来看，东部地区的上海、广东、山东、海南、北京位居全国前五位，而西部地区，如宁夏、内蒙古、新疆、贵州、甘肃和青海等省份处于相对靠后的位置。从2013-2018年的平均发展增速来看，西藏、湖南、黑龙江、广西、河北等省份的增速达到了20%及以上。表明开放方面，由于地理优势和历史原因，东部沿海地区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在“一带一路”等对外开放政策的刺激下，中西部地区正在加快开放的步伐。

从共享发展质量指数来看，东部地区的北京、上海、辽宁、浙江、江苏位居全国前五位，新疆、甘肃、贵州、宁夏、云南、青海和西藏等西部省份排名靠后；从2013-2018年的平均发展增速来看，西藏、贵州、云南、广西、湖南、四川、青海、新疆等中西部省份实现了正向增长，其

他省份均为负向增长。表明共享方面，东部地区的整体水平较高，但是增长缺乏后劲，而中西部地区的初始水平较低，却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尤其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在公共服务水平以及脱贫攻坚等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共享发展水平有望进一步提高。

四、我国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平衡测算及分解

上文对我国总体、区域以及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本节将进一步对我国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平衡性进行测算和分解，从新发展理念的五维度深入分析我国总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的原因。

（一）2013-2018年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平衡程度的变化趋势

本文主要采用基尼系数的方法来刻画我国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平衡情况。表4给出了2013-2018年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和五大发展指数的基尼系数，图4主要描述2013-2018年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和五大发展指数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

表4 2013-2018年我国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尼系数

年份	创新发展 指数	协调发展 指数	绿色发展 指数	开放发展 指数	共享发展 指数	综合发展 指数
2013	0.388	0.118	0.069	0.449	0.108	0.118
2014	0.388	0.112	0.078	0.450	0.105	0.125
2015	0.380	0.102	0.079	0.450	0.096	0.126
2016	0.377	0.090	0.085	0.441	0.096	0.117
2017	0.368	0.090	0.081	0.424	0.090	0.110
2018	0.379	0.093	0.083	0.409	0.083	0.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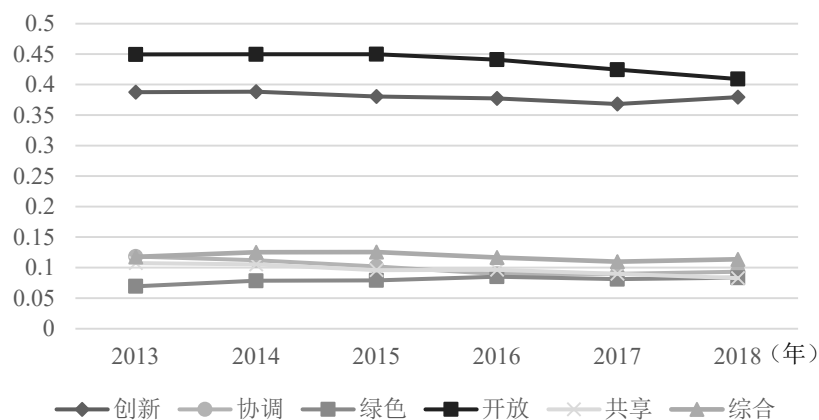


图4 2013-2018年我国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尼系数变化趋势

由表4和图4可知，2013-2018年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尼系数呈下降趋势，说明我国省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有所下降。其中，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指数的基尼系数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保持在较高水平，表明我国各省份之间创新和开放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不平衡程度略有减缓；绿色发展指数的基尼系数虽然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但是整体呈现出小幅上升趋势，说明我国各省份绿色发展不平衡程度虽然较小，但是存在进一步加剧的风险。

（二）2013-2018年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平衡的分解

进一步，本节主要分析五个发展维度对于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为了更加清晰

地测度五个发展维度的贡献率和边际影响，本文采用 Lerman 和 Yitzaki (1985) 在收入不平等研究中提出的不平等分项收入分解法。从本文的假设出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Y 由五个维度的发展指数 $Y^k, k = 1, 2, 3, 4, 5$ 组成，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指数。假设省域之间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平衡程度由基尼系数来刻画，根据 Lerman 和 Yitzaki (1985) 的方法，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基尼系数可以分解为五个维度发展指数的基尼系数加权之和。

$$G(Y) = \sum_{k=1}^5 C_k = \sum_{k=1}^5 R_k G_k S_k = \sum_{k=1}^5 \bar{G}_k S_k \quad (4)$$

$$c_k = C_k / G(Y) \quad (5)$$

其中， $G(Y)$ 表示省域之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基尼系数， C_k 表示分项指数对基尼系数的绝对贡献值， c_k 表示相对贡献率， S_k 表示分项指数占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比重， G_k 表示分项指数本身的基尼系数。 R_k 表示分项指数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基尼相关系数， $R_k = \frac{\text{cov}[Y^k, (1-F_0)]}{\text{cov}[Y^k, (1-F_k)]}$ ， F_0 、 F_k 分别表示 Y 和 Y^k 的经验分布函数。 \bar{G}_k 表示分项指数的集中率，为 G_k 与 R_k 的乘积，也称为拟基尼系数。由此，各分项指数对于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平衡的边际影响可以表示为：

$$\partial G / \partial e_k = S_k (R_k G_k - G) = S_k (\bar{G}_k - G) \quad (6)$$

其中， e_k 表示每个省份分项发展指数 Y^k 的边际变动幅度， $e_k = (1-e)Y^k$ ，即由 Y^k 变动到 eY^k ，且 e 趋近于 1。若 $\bar{G}_k > G$ ，则 $\partial G / \partial e_k > 0$ ，说明分项指数对于高质量发展不平衡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反之，起到负向的抑制作用。具体而言，中国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平衡的分解情况如表 5 所示。

表 5 2013-2018 年中国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平衡的分解

年份	分解项	创新发展	协调发展	绿色发展	开放发展	共享发展
2013 年	指数占比	0.109	0.228	0.312	0.094	0.257
	绝对贡献	0.038	0.013	0.003	0.038	0.025
	贡献率	32.19%	11.06%	2.79%	32.51%	21.46%
	集中率	0.347	0.057	0.011	0.407	0.098
2014 年	指数占比	0.111	0.238	0.305	0.101	0.245
	绝对贡献	0.039	0.015	0.006	0.042	0.022
	贡献率	31.28%	12.30%	4.95%	33.79%	17.68%
	集中率	0.352	0.051	0.020	0.418	0.090
2015 年	指数占比	0.115	0.243	0.315	0.105	0.251
	绝对贡献	0.040	0.015	0.005	0.043	0.022
	贡献率	31.94%	11.78%	4.26%	34.60%	17.42%
	集中率	0.348	0.049	0.017	0.412	0.087
2016 年	指数占比	0.118	0.231	0.308	0.095	0.247
	绝对贡献	0.040	0.010	0.008	0.038	0.020
	贡献率	34.37%	8.91%	6.53%	33.00%	17.19%
	集中率	0.340	0.042	0.025	0.404	0.081
2017 年	指数占比	0.120	0.230	0.306	0.096	0.248
	绝对贡献	0.038	0.010	0.009	0.037	0.016
	贡献率	34.89%	8.80%	7.84%	33.87%	14.60%
	集中率	0.320	0.053	0.028	0.387	0.065

续表

年份	分解项	创新发展	协调发展	绿色发展	开放发展	共享发展
2018年	指数占比	0.114	0.235	0.299	0.101	0.252
	绝对贡献	0.038	0.012	0.009	0.039	0.016
	贡献率	33.06%	10.44%	8.34%	34.25%	13.91%
	集中率	0.330	0.050	0.032	0.385	0.063

表5的分解结果显示，从占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比重来看，平均而言绿色发展指数占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比重最高，创新发展指数最低，表明从各省份的平均情况来看，绿色发展对高质量发展的贡献程度最大，而创新发展的贡献程度最小。从对高质量发展不平衡的贡献率来看，省域间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平衡主要源于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的不平衡，二者的贡献率均大于30%；从贡献率的演变趋势来看（见图5），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的变化幅度最大，绿色发展的贡献率不断上升，从2013年的2.79%上升到2018年的8.34%；共享发展的贡献率不断下降，从2013年的21.46%下降到2018年的13.91%，说明绿色发展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越来越占据重要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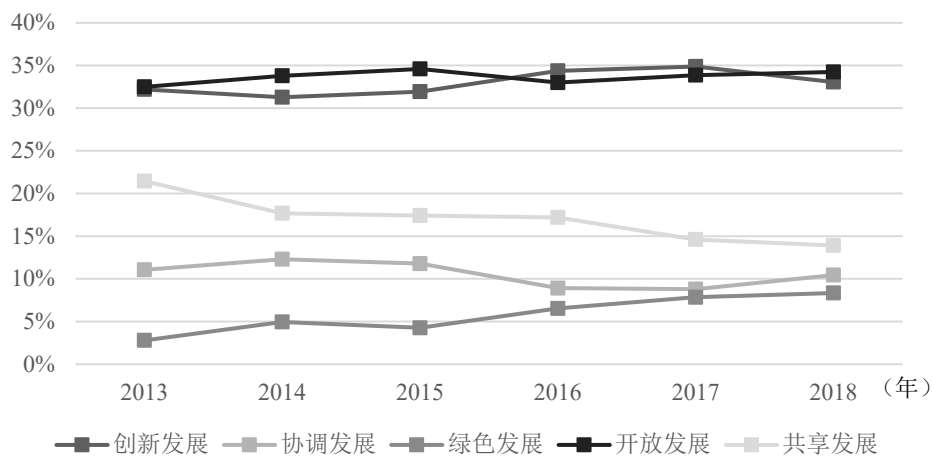


图5 2013-2018年各分项指数贡献率的变化趋势

表6 各分项指数对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平衡的边际影响 ($\partial G / \partial e_k$)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创新发展	0.025	0.025	0.026	0.026	0.025	0.025
协调发展	-0.014	-0.014	-0.016	-0.017	-0.016	-0.015
绿色发展	-0.033	-0.032	-0.034	-0.028	-0.025	-0.024
开放发展	0.027	0.030	0.030	0.027	0.027	0.027
共享发展	-0.005	-0.009	-0.010	-0.009	-0.011	-0.013

根据(6)式，计算得到各分项指数对于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平衡的边际影响（见表6）。表6表明，2013-2018年各分项指数的边际影响基本保持不变。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的边际影响分别保持在0.025、-0.015、-0.03、0.027和-0.01左右。根据表5和表6的结果，由于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的集中率大于高质量发展的基尼系数，其边际影响效应均为正数，说明这两项发展指数对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平衡起到促增作用；其他三项发展指数的边际效应为负数，说明其他三项发展指数对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平衡起到促减作用。即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

促进了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平衡，而协调发展、绿色发展以及共享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平衡。

(三) 2013-2018 年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不平衡的分解

上文的研究表明，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不平衡是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影响因素。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对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的不平衡结构进行分解。同样，按照 Lerman 和 Yitzaki (1985) 的方法，基于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的二级指标维度对两项指数进行分解。即从创新发展、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成效四个维度分析创新发展不平衡的来源；从开放深度和开放结构两个维度分析开放发展不平衡的来源，具体分解结果见表 7 和表 8。从各项二级指标的基尼系数变化趋势来看，2013-2018 年，创新产出和创新成效的基尼系数较高，均超过了 0.5，但呈现出下降的变化趋势。省域之间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成效的不平衡程度较高，呈现出下降趋势；开放深度和开放结构的基尼系数在 0.5 左右，均保持较高的水平，省域间的开放深度和开放结构不平等程度较高。从不平衡的贡献率来看，创新成效对创新发展不平衡的贡献率最高，接近 40%；开放深度对开放发展不平衡的贡献率最高，到了 70%以上。从不平衡的边际影响来看，创新产出和创新成效对创新发展的边际影响为正，开放深度对开放发展的边际影响为正，说明省域之间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成效不平衡是创新发展不平衡的主要来源，而省域间开放深度不平衡是开放发展不平衡的主要来源。

表 7 2013-2018 年各二级指标对创新发展不平衡的贡献率和边际影响

年份	创新发展											
	创新基础			创新投入			创新产出			创新成效		
	基尼系数	贡献率	边际影响	基尼系数	贡献率	边际影响	基尼系数	贡献率	边际影响	基尼系数	贡献率	边际影响
2013	0.254	11.50%	-0.06	0.385	23.70%	-0.008	0.615	25.60%	0.019	0.576	39.10%	0.024
2014	0.270	12.80%	-0.055	0.362	20.70%	-0.016	0.601	27.80%	0.020	0.579	38.70%	0.025
2015	0.263	13.90%	-0.059	0.375	12.10%	-0.033	0.592	31.60%	0.021	0.558	42.40%	0.021
2016	0.259	11.60%	-0.053	0.356	21.70%	-0.013	0.588	28.70%	0.02	0.548	38.00%	0.023
2017	0.257	12.00%	-0.051	0.349	22.80%	-0.011	0.593	26.60%	0.019	0.533	38.60%	0.022
2018	0.254	11.50%	-0.057	0.378	24.30%	-0.003	0.586	27.60%	0.019	0.526	36.70%	0.02

表 8 2013-2018 年各二级指标对开放发展不平衡的贡献率和边际影响

年份	开放发展					
	开放深度			开放结构		
	基尼系数	贡献率	边际影响	基尼系数	贡献率	边际影响
2013	0.495	72.20%	0.013	0.521	27.80%	-0.013
2014	0.502	77.50%	0.023	0.515	22.50%	-0.024
2015	0.532	72.30%	0.032	0.486	27.70%	-0.064
2016	0.536	70.60%	0.032	0.474	29.40%	-0.038
2017	0.496	71.60%	0.024	0.488	28.40%	-0.027
2018	0.482	74.40%	0.029	0.476	25.60%	-0.033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新发展理念的内涵出发，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基于 2013-2018 年的省级层面宏观数据，对我国经济处于中高速增长期的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及不平衡程度进行评估。研究发现：(1) 中国总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其中，创新发展与共享发展增长幅度较大；(2) 东部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但是中西部省份体现出更强的增长势头；(3)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平衡程度有所降低，但是省域之间的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水平差距拉大。基于此，本文提出如

下建议:

第一, 挖掘各地区比较优势, 优化不同地区高质量发展模式。根据评价结果, 东部地区在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等方面有传统优势, 中西部地区则在协调发展、绿色发展方面具备后发优势, 东北地区具备较好的协调发展、共享发展基础。各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结构和优势均有所不同,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 在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 地区间差异在逐步缩小, 但地区内差异有扩大趋势, 特别是在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方面。在迈向新发展阶段过程中, 各地区应根据各自发展基础和资源、要素禀赋差异, 选择差异化发展路径。东部地区应聚焦质量为先、标准化、精益化、管理优化相结合的质量提升路径, 推动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质量保护并重的发展模式。中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潜力较大, 且近年来后发优势正在逐步显现, 应立足资源禀赋优势, 跳出传统“资源开发诅咒”发展陷阱, 将能源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因素, 驱动经济增长,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而不是作为长期经济增长的依赖性资本。东北地区则应全面强化创新发展理念, 以创新发展为突破口优化发展模式。

第二, 加大创新投入力度, 加强高端科技创新人才能力培养。各省份之间创新发展不平衡程度较高。具体看, 东部地区的大部分省份和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增速均为负增长, 说明具备传统发展优势的地区正在面临转型升级, 保持和重塑发展动能将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从2013-2018年高质量发展平均增速看, 宁夏、江西、贵州、河南和重庆在创新发展方面位居全国前列, 东部地区虽然仍保持传统领先地位, 但应进一步加大对创新的投入力度, 加强科技创新人才能力培养, 从创新链视角“强基础、高投入、促产出、提成效”, 加快构建完善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生态, 夯实创新基础, 增加创新投入, 增加创新产出, 提高创新质量。同时, 不同区域应结合实际需求与比较优势, 打造差异化人才吸引与培养战略, 推进高端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打造一批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第三, 强化区域协调战略, 改善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生特点, 协调发展整体贡献度变化不大, 以推动城市群发展为龙头, 不断优化产业结构。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 我国区域间高质量发展不平衡状况正在不断得到改善, 但区域间发展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创新发展与开放发展的区域间不平衡始终处于较高水平, 绿色发展水平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应以强化区域协调战略为重点, 规划实施东中西部不同区域协调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差异化战略, 发挥东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示范作用, 建设以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一体化经济带等为代表的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域, 维持中西部当前较好的发展势头, 加快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构建形成西部开发新格局, 完善更加协调、高效、融通的东中西部区域间协调发展新机制。

第四, 挖掘优势, 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各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差距明显, 且有进一步扩大的风险, 应结合实际, 挖掘地区绿色发展优势, 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不同地区应根据自身发展阶段、发展需求, 整体谋划绿色产业转型发展, 科学有序统筹布局, 形成以现代农业、循环工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绿色供应链为主导的绿色产业新格局。东部地区可以着力培育绿色新兴产业, 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产业与新兴产业融合。充分挖掘中西部的绿色发展潜力, 将绿色发展潜力转化为后发优势。例如, 重庆、西藏、云南、贵州等西部省份在自然环境资源、生态保护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 则可以着力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清洁化改造, 同时超前布局绿色新兴产业。现代化产业基础较好、总体经济社会相对发达的地区, 应该定位在尽早实现碳中和, 而现代化产业基础相对薄弱、资源依赖程度相对较高、总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 绿色发展目标应定位为尽早实现碳达峰。

第五, 以更大力度深化开放发展,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本文研究发现开放发展是唯一呈现略有下降趋势的指数, 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开放程度较低, 出口表现并不理想。从开放深度与开放结构两方面看, 不同区域呈现较明显的分化特征。应推动东部地区更高水平开放,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积极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西部地区抓住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历

史机遇，着力发掘区位优势，优化劳动力结构，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实现外通内联，更好发挥“一带一路”政策的带动作用，推动形成一批西部地区开放发展的新城市集群。

第六，补齐民生短板，推动共享发展。以各地区老百姓实际需求为导向，着力补齐民生短板，大力提升共享发展水平。东部地区特别是一些超大城市应进一步提升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以实际人口流向为依据完善教育和医疗体系配套建设，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中西部地区应在财政可持续基础上，适当提高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支出比例，加大对公共服务薄弱环节的投入力度，尽快补齐基本公共服务与发展基础设施短板，营造良好的居民生活、生产环境。同时，强化就业服务，把提高就业作为关键举措，完善就业创业服务机制，破除区域间劳动力流动的机制障碍，持续优化就业结构，为提高居民收入筑牢根基，缩小收入差距，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目标逐步实现。

参考文献

- [1] 陈诗一, 陈登科. 雾霾污染、政府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 经济研究, 2018, 53(02):20-34.
- [2] 杜爱国.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逻辑与前景展望[J]. 学习与实践, 2018(07):5-13.
- [3] 高培勇, 杜创, 刘霞辉, 袁富华, 汤铎铎.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一个逻辑框架[J]. 经济研究, 2019, 54(04):4-17.
- [4] 高培勇, 袁富华, 胡怀国, 刘霞辉. 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与治理[J]. 经济研究, 2020, 55(04):4-19.
- [5] 简新华, 聂长飞. 论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J]. 社会科学战线, 2019(08):86-95.
- [6] 凌连新, 阳国亮.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J]. 统计与决策, 2020, 36(24):94-97.
- [7] 刘志彪, 凌永辉. 结构转换、全要素生产率与高质量发展[J]. 管理世界, 2020, 36(07):15-29.
- [8] 鲁邦克, 邢茂源, 杨青龙.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与时空差异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19, 35(21):113-117.
- [9] 吕承超, 崔悦. 中国高质量发展地区差距及时空收敛性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 37(09): 62-79.
- [10] 马茹, 罗晖, 王宏伟, 王铁成. 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测度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9, (07): 60-67.
- [11] 聂长飞, 简新华. 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测度及省际现状的分析比较[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 37(02): 26-47.
- [12] 欧进锋, 许抄军, 刘雨骐. 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广东省 21 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J]. 经济地理, 2020, 40(06):77-86.
- [13] 沈利生, 王恒. 增加值率下降意味着什么[J]. 经济研究, 2006(03): 59-66.
- [14] 孙志燕, 侯永志. 对我国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多视角观察和政策应对[J]. 管理世界, 2019, 35(08): 1-8.
- [15] 王一鸣. 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J]. 管理世界, 2020, 36(12): 1-13.
- [16] 吴志军, 梁晴.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比较与战略路径[J]. 当代财经, 2020(04): 17-26.
- [17] 严成樑.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脉络与未来展望——兼从中国经济增长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缺陷[J]. 经济研究, 2020, 55(07):191-208.
- [18] 杨耀武, 张平.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测度与治理[J]. 经济研究, 2021, 56(01): 26-42.
- [19] 叶辅靖, 李大伟. 坚定不移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N]. 经济日报, 2021-03-04.
- [20] 余泳泽, 杨晓章, 张少辉.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时空转换特征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9, 36(06):3-21.
- [21] 袁晓玲, 李彩娟, 李朝鹏.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现状、困惑与展望[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9(06):30-38.
- [22] 张军扩, 侯永志, 刘培林, 何建武, 卓贤. 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和战略路径[J]. 管理世界, 2019, 35(07):1-7.
- [23] 张震, 刘雪梦. 新时代我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与测度[J]. 经济问题探索,

- 2019(06):20-31+70.
- [24] 张平, 刘霞辉, 袁富华, 陈昌兵. 突破经济增长减速的新要素供给理论、体制与政策选择[J]. 经济研究, 2015, 50(11):4-19.
- [25] Ahmed F, Kousar S, Pervaiz A, et al, Do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Affect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South Asian Countries[J], Borsa Istanbul Review. 2021, 1-8.
- [26] Barro R J.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M]. Santiago de Chile: Banco Central de Chile, 2002.
- [27] Gu W, Wang J, Hua X, et al. Entrepreneurship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riple bottom lin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2021, 17(1): 1-27.
- [28] Hong Y,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1994, 6(1): 13-8.
- [29] Jahanger A. Influence of FDI characteristics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21, 28: 18977-18988.
- [30] Jorgenson D W, Griliches Z. The explanation of productivity change[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7, 34(3): 249-283.
- [31] Josef, Gregory, Mahoney, 2020., Quality Over Quantity[J], Beijing Review, 63(05): 20-21.
- [32] Lerman R I, Yitzhaki S. Income inequality effects by income source: A new approach and applications to the United State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5: 151-156.
- [33] Manish G P, 2016, Market Reforms in India and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8(2): 241-262.
- [34] Peng W, Yin Y, Kuang C, et al.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green innovation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lity in China: Evidence from a panel data of 270 prefecture-level and above cities[J].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2021, 69(2):102863.
- [35] Sabatini F . Social Capital and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Kyklos, 2008, 61(3): 466-499.
- [36] Solow R M ,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 65-94.
- [37] Train R E .The Quality of Growth[M]. Published for the World Bank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38] Zhou J, Raza A, Sui H.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J]. Applied Economics, 2021, 53(23): 2615-2630.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valuation and the Measurement of Unbalanced of Provincial Economy in China

MO YANG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MEILI ZHU

(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TINGTING YI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Using the province-level panel data from 2013 to 2018,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ased on the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of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 and Sharing, and use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unbalanced degree of China's provinci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findings show that: (1) the level of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as been steadily improved, among which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shared development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2) the eastern provinces have a higher level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hile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show a stronger growth momentum; (3) although the unbalance degre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mong provinces has declined, the unbalanced degree of innovation and open development is relatively high, which increases the overall disequilibrium degree.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or example, we should take measur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fully excavate regional advantages, increase investment in innovation, strengthen regional coordination strategy,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green, low-carbon and circular economic system, further expand opening up and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 weak links in people's livelihood.

Key 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Provincial Economy

执行编辑（秦光远）